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记忆



有人说中国的历史“千年看西安,百年看上海”。上海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中国第一大工业、商业、金融城市,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。这一个多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和上海有关。我的父亲罗瑞卿也和上海存着深深地牵连。他从这里走向苏区,加入中央红军跟随毛主席奋斗终生,又在这里栽倒,成为“文革罪人”。上海是让他又爱又痛的地方。总在时时勾连我们的记忆。

一

我的父亲第一次到上海是1928年8月,之前他是武汉黄埔的学生,为了参加“八一”南昌起义,由武汉黄埔学生组成的教导团从武汉乘船南下,经过九江时被张发奎阻拦并解散了,公开了组织关系的随陈毅南下找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了,没有暴露政治面目的学生被遣散了。父亲回到了武汉大病一场,得的是斑疹伤寒,差一点送了命,靠一个姓熊的龛师每天喂他一点几米汤慢慢好起来。但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,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后来听人说党中央在上海,到上海可能会找到组织的人,这样他和几个四川籍的黄埔同学辗转来到上海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,几经辗转,中央派欧阳钦(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)同志在黄浦滩(今外滩)公园和父亲接上了头,通知他关系已恢复,以后由一位交通叫陈德的与他联系,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。这样,他就像一个长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一样,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,踏实多了。1962年我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,临去哈尔滨之前,他跟我讲了这段经历,还交代我星期天可以去看欧阳钦伯伯。他始终不忘这艰难的寻找和接头,这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活的开头呀!

因为他是黄埔的学生,中国工农红军急需懂军事的人才,1929年3月期间,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山东征,一路打到闽西,打下了汀州,军委决定派父亲到闽西找中央红军。于是,父亲乘坐一艘日本船,同行的共有七人,离开了上海去厦门。直到上海解放后的五十年代,父亲才回到上海,这一去二十多年,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二

离开上海前,听说梅兰芳到了上海,父亲是个戏迷,特别崇拜梅老板,有梅老板的戏,一定要想法去听,他当了自己的铺盖买了一张站票,过了一把戏迷瘾。解放后见到梅兰芳说起这段往事,梅老板说:怎么,和我耍铺盖钱呀!……说起这段上海经历,父亲眉飞色舞、感慨万千!全国解放后,父亲出任公安部副部长,因工作或陪同毛主席到上海的次数就多了。我第一次随父亲去上海是1951年2月。当时我在武汉大学,我们的学校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上了庐山,父亲从广州北上沿路视察各地的公安工作,派人把我接到了南昌,他到南昌和我们汇合后就随他路经上海回北京,和他同行的还有我大妹妹罗哈田,邓发烈士的女儿邓金娜。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到过上海,到了上海就



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成员:司令员杨得志(中)、政委罗瑞卿(右二)、第二政委杨成武(左二)、参谋长耿飏(右一)、政治部主任潘自力(左一)

罗瑞卿和上海

◆ 罗箭

【作者简介】

罗箭 原名罗小卿(罗小青),1938年4月生于延安。抗战胜利后到河北阜平县,后入“八一小学”(原荣臻小学),1949年进入北京,毕业后上北京师大二附中(即现在的北京一零一中),中学毕业后,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,1961年2月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,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基地研究所,参加了我国第一次、第二次核试验,两次荣立三等功。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,被停职。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缫丝厂当工人。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21试验基地研究所,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,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任政委,之后又调入后勤部任副政委,1994年被授以少将军衔。1996年退休。

▼ 1952年,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。前排左起:粟裕、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、程潜、刘少奇、陈毅;中排左起:聂荣臻、高岗、张治中、邓小平、张云逸、刘斐;后排左起:罗瑞卿、贺龙、蔡廷锴、傅作义、刘伯承



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眼睛都不够使了。我们先上了外滩当时最高的大厦,第一次坐电梯上了十八层鸟瞰外滩和全上海。又去逛了南京路,进了号称上海“三大公司”之一的永安公司,买了一些日用品,又按妈妈的意见买了两辆儿童自行车。当时公司还有摸奖活动,小孩子爱热闹,就由我去摸,竟然摸到了一个头等奖,那可是个大奖,有500万(旧币,相当于现在的500元),爸爸妈妈当时还是供给制,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津贴,500万在当时也算个天文数字了,结果惊动了老板,出来打圆场,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不占老百姓便宜,不应拿这么多钱。带我们去的秘书、警卫员更没有要他这个钱的意思,老板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,我们很高兴。

三

“文革”前我父亲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65年12月了,而且不在他的计划安排之中,是被突然叫去的。当时毛主席提出“备战备荒”,我父

亲到广西、云南边境地区查看地形,还接到小平伯伯的一个电话,说他和李富春、李井泉正在昆明,让他赶到昆明见面,父亲说恐怕不行,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完,要到河口、老街看完后才能到昆明,到昆明后还约好和妈妈一起到西双版纳。不久听温玉成说上海要开会,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,邓小平都要去,你怎么不知道?父亲因为其他事和杨勇通电话,杨在电话上说第二天他要同贺龙、肖劲光到上海开会,什么内容不清楚。第二天到了一个军分区,父亲亲自给彭真伯伯打电话,彭在北京值班,他应该知道。可彭也不知道,说可能是讨论作战问题,总理在电话上,说不是,是庐山会议性质的问题。父亲问是谁?彭说不知道,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,会写信告诉他,他接到信后再告诉父亲。过了一两天彭伯伯来电话了,说上海会议分批开,我和你是第二批。马上总理电话也到了,要父亲11日起到上海开会,父亲问什么事?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,来了就知道了。这样父亲9日

赶到昆明(而在昆明等他的邓小平、李富春、李井泉已经飞往上海了)。10日在昆明停了一天,在昆明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了话,11日和先前已经到昆明的妈妈一块坐飞机从昆明到了上海。

后来才知道,上海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,常委才7人,可参加会议的多达几十人,连不是中央委员的叶群都参加了。事先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,常委中只有毛、林、周知道,刘少奇、朱德、邓小平都是到了上海后才到。军队中也是少数人才知道,其中像杨成武、肖华等人还是林彪亲自打了招呼的。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也不知道,他也以为是研究作战问题。

四

父亲后来回忆这次到上海充满了诡异,下了飞机就感到气氛不对。在机场等着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。以往接机、送机吴法宪在机场是最忙碌的,跑前跑后,拿大衣,开车门的事都要抢着做,这次却板着脸面孔一直催促“快上车!快上车!”。陈丕显和爸爸、妈妈坐在同一辆车上,爸爸急于解开心中的谜团,一上车就问:“阿丕,开什么会呀,这么紧张?”陈指了指前排的司机和警卫人员,意即不便说,接着东拉西扯起天气、交通、工农业生产等,气氛十分尴尬。快到驻地时陈又说锦江饭店已经满了(以往每次来上海几乎都住锦江饭店),这次换个地方住公馆,在建国西路618号。又说总理和小平同志在公馆等着和你谈话。进了会客室见到总理和小平伯伯,总理才告诉他上海会议就是解决你的问题,父亲犹如听到一个晴天霹雳,他事先一点迹象也未察觉到,也没想到这次会整到他的头上。总理说了他几个问题,第一个就是和林彪的关系,林彪说对他六年的观察,发现父亲有意封锁他。

据父亲后来回忆,1959年任总长时主席找他谈话,说我是军委主席,你作为秘书长军队的事情你一个月向我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?父亲说保证做到。主席又说一个星期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?父亲又说保证做到。可林彪给他规定凡是向主席汇报的事,向主席送的文件必须先向他请示,同意了才能去汇报、去送。这给父亲出了很大的难题,林彪身体不好,经常在外地休养,主席在北京突然召父亲去汇报,根本无法事先请示林彪,只能事后汇报,主席有时和其他老师,有时和父亲当场商量就定了。林彪认为父亲有意“架空”他,企图让主席冷落他,这当然是林彪最不能容忍的事。第二条反对“突出政治”,阳奉阴违,搞“折中主义”。实际上父亲就是反对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,立竿见影,实用主义的做法,他支持罗荣桓元帅的提法,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,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。为此林彪还发了脾气,说什么肖华、杨成武这些人离开我都没有关系,你们两个罗,一个“大罗”,一个“小罗”(中央苏区时期对罗荣桓、罗瑞卿的称谓)离开我,我就难过。第三条和同志们关系不好,几个老师也有意见,底下人意见更多。但刘伯承元帅替他说了公道话,刘帅说:“说罗瑞卿不尊重老师,封锁我们,我没有感觉,他还是经常到我这里来汇报的。”爹爹朱德已经不管军队的事了,从上海开会回来经常一个人独自叹气,在康妈妈一再追问下,才叹口气说:“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,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,经毛主席同意的,说他篡军反党,无法让人相信。为什么要撤?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,像这样可靠的人都要撤,打击面宽了,真假失去了标准,今后党内要不安了。”真给爹爹不幸说中了,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来了。总理谈完后,邓小平接着传达

主席、常委的意见,情节是严重的,只要认真地改,仍然允许革命。

可能是总理和小平的安排,第二天晚上,陶铸先来看父亲,第三天上午李井泉也来看父亲……

12月15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来第二次谈话,传达主席和常委们的意见,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军队继续工作已不适宜,可以写个报告请示调离军队。有些事不承认可以挂起来,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,挂百年不行,还可以挂一万年。会议今天就结束了,17日和他们同机回北京。这次卓琳阿姨也来了,上楼去看了妈妈。妈妈一见到卓琳阿姨就哭了,说:卓琳,你看,别的还可以说,说他反对林彪副主席,怎么会有这种事?卓琳阿姨也哭了,说有什么办法呢?她要妈妈不要太难。现在只有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解决。17日父亲和总理、小平伯伯、李富春同机回京。同机的还有张茜(陈毅元帅夫人)一个人,张茜阿姨手里拿着一枝花,上了飞机就送到妈妈这里,说我就送给你一个人!

五

打到“四人帮”后许多人都对上海会议感兴趣,总想解开这个谜团。父亲在世的时候来问的人很多,问的人多了父亲也觉得烦了,后来他精炼成一句话:“林彪想拉我入伙,我不干!”关键是毛主席的态度,为什么会同意林彪整罗瑞卿呢?上海会议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前奏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,毛主席需要林彪,所以听了他的一面之词。1965年11月,父亲陪同柬埔寨国防部长朗诺到上海见主席,曾对主席说要去苏州看望林彪。主席反应很快,很认真地交代:“去看看好,要他好好休养,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,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。”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,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,主席让大家充分揭露问题,所谓“白天出气,晚上看戏”。主席认为三年多来的成绩和错误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,但多数人同意少奇同志的分析,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。人祸中也包括苏联人逼债造成的因素。这时林彪出来讲话,说:“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,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。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,受到干扰的时候,就会出毛病。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。”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亲自作了修改印发全党,并加上按语:“这是一篇很好,很有分量的文章,看了很高兴。”到了武汉还问父亲:“林彪的这一篇讲话,你讲不讲得出来?”父亲老老实实地说: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。”毛主席严厉地说讲不出来要好好学嘛!主席现在又提这个话应该是向林彪传达该请他出山的信息了。同时也希望缓和一下林和罗的关系。但林彪听到这个口信却下了整倒父亲的决心,于是立刻要吴法宪安排飞机,让叶群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到杭州向主席告状去了。

我猜测主席的大意是让父亲离开部队,到地方去工作,像早已倒台的谭政叔叔到哪个省当个副省长,离开漩涡。所以在上海会议期间还对林彪说过,说他反对你,他还没有反对过我嘛,只有一次反对我游泳,那还是为了我好嘛!但主席想打圆场,林彪不干,非置父亲于死地而后快,主席为了自己的“大事”只好由他去了。林彪摔死后这个障碍没有了,1973年12月小平伯伯向主席建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,提到父亲时,主席马上说,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,所以犯了错误。小平讲,在上海的时候,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,他不满意。我赞成他。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,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。随后父亲就被解除监护。

父亲到底到过上海多少次?已不可数,但这一头一尾的上海之行却始终令他刻骨铭心,成为他一生中经历中两道深深深刻痕。